



梁启超
著

名人传记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名人传记

梁启超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名人传记 / 梁启超著 . 一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2

ISBN 7-5306-3279-5

I. 名… II. 梁… III. 历史人物 - 列传 - 中国 -
古代 IV. K82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762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

邮编: 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 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3.625 插页 2 字数 306 千字

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 册 定价: 22.00 元

序

夏晓虹

在近现代出版史上，梁启超撰写于 20 世纪初的多种传记，曾经独立于文集，数次结集行世。如果考虑到当年避难日本的梁氏本以政论家闻名海内外，则其史传之不受时事影响，甚而至于历久弥新，便是一殊堪玩味的现象。

历数梁启超传记文的写作，1901 年实为关节点。这一年的 12 月，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与《李鸿章》先后脱稿。次年 2 月，《新民丛报》在日本横滨创刊，梁启超对传记的著述兴趣一发而不可收，笔涉的人物也从同时代扩展到西方近世及清以前。在梁氏 1903 年 2 月离日游美以前，《新民丛报》的“传记”栏全部由其包揽，接连刊发了《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》、《张博望班定远合传》、《意大利建国三杰传》、《(近世第一女杰)罗兰夫人传》、《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》。1904 年 4 月，梁启超重新主持《新民丛报》后(此时刊物出版脱期)，不仅续写完《克林威尔传》，又新成《(明季第一重要人物)袁崇焕传》、《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》及《(祖国大航海家)郑和传》。最后一文刊载于 1905 年 5 月第 69 号杂志上，该刊的“传记”栏亦自此收场。其实，除去离

开日本期间，曾由他人填补空白，此外，《新民丛报》的“传记”栏确可视为梁启超的专栏。而栏目的取消并不是其传记写作生涯的终结。1908与1909年，他又有《王荆公》与《管子传》二著问世，且王安石一传的篇幅，在梁氏所有著作中也属空前巨制。

梁启超对传记体的迷恋，在《管子传》的成书上表现最为充分。先有广州汤学智应《新民丛报》征文撰写了《管子传》，此文尽管被评为第一名（甲等），但1903年2月在该刊发表时，已非本来面目。原因是这篇被梁氏许为“搜辑甚勤，不胜钦佩”的传文，仍让他感到美中不足，“嫌其意义有所未尽”。于是，竟不容分说，夺过汤氏之笔，越俎代庖。自己虽谦称是“偶奋笔为之订改”，实则是“滔滔不能自休，遂至改原稿十之六七”。末了还要自我开脱，说：“非敢有意点窜高文，窃附‘赏奇析疑’之义云尔。”要求“作者谅之”（第25号“新年大附录一”为“悬赏征文披露”所作说明）。远在广东的汤学智是否原谅梁氏的擅自斧削增润，不得而知；不过，改动过半的文章再冠以汤名，既不符合事实，也颇有强加于人之势。为此，1904年，梁启超重掌《新民丛报》后出版的第46—48号合刊，在登载《本社告白》，向读者许愿将续刊因总撰述梁氏出游而中断的连载篇目时，《管子传》后面便没有像其他各目一样系属作者——那确实已不能算作汤学智之文。只是，这续成的诺言五年后才兑现，已刊的部分也做了大修订。如此，经十六日写成的《管子传》，便可当之无愧地归入任公先生名下了。

实际上，梁启超的传记书写史并非以《南海康先生传》开篇。即使发表于戊戌前的《记江西康女士》、《记东侠》、《三先生传》以其简略，可以忽略；而1898年9月底亡命日本后，陆续在

《清议报》连载、随后成书的《戊戌政变记》，却已含有日后影响甚大的《殉难六烈士传》。只是，从传记体裁的演变看，此六传仍可归入《史记》以来的纪传传统。虽然因作者与各传主均有交谊，可更多通过对话刻画人物；但一些并无第三者在场的密谈，仍写得口吻逼真。如谭嗣同夜访袁世凯的著名一幕——

（谭）乃直出密诏示之曰：“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，惟在足下，足下欲救则救之。”又以手自抚其颈曰：“苟不欲救，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，可以得富贵也。”袁正色厉声曰：“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？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，仆与足下，同受非常之遇，救护之责，非独足下。若有所教，仆固愿闻也。”

当谭说出杀荣禄之计后——

乃曰：“荣禄固操、莽之才，绝世之雄，待之恐不易易。”袁怒目视曰：“若皇上在仆营，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。”（《谭嗣同传》）

此事经过虽有谭嗣同可为梁传达，但传文之绘声绘色，如临其境，更是得自太史公笔法。《史记》之擅长以人物语言（包括对话与独白）复原历史场景，刻画人物性格，久已在人耳目。其所采取的全知叙事立场，也使得司马迁对笔下人物具有绝对的知情权。在这一点上，梁作与之如出一辙。至于六烈士传每篇均先书传主名号、里籍，末缀以论评，也一本《史记》开创的列传体例。在梁启超，借用庄重的正史体裁应当还有一份深意，即不申

私情，单凭公义，六烈士亦该名垂青史。

尽管《殉难六烈士传》在梁启超的传记文中知名度最高，不过，就梁本人的创作史而言，此传的意义主要在于演示其袭用传统纪传体式所能够达到的辉煌。接下来，这位趋新好奇的文章家开始转官换调。东渡日本后耳濡目染、广泛阅读的新式传记——评传，很快出现在其笔下。《南海康先生传》就是新装登场的首次成功演出。

与谭嗣同、康广仁诸传不同，模拟口吻、增加现场感的对话已从康有为传中彻底消失。论交往之久，康之收梁为弟子还在梁结识诸人前，可记录的言行应当更多。而梁启超之舍此取彼，宁愿站在史家的客观立场处理史料，意在昭示其自觉疏离犹带小说笔意的旧传体式。

限于康传乃是为纪念《清议报》出版100期赶写的专稿，与独立发行的著作有别，梁启超故未详述其撰写体例。仅在结尾处引用英国首相克林威尔斥责画家之言：“Paint me as I am.”“盖恶画师之谀己，而告以勿失吾真相也。”以表示自己不溢美、不讳恶、公正如实的著述态度。这一名言以后屡次为梁征引，“自信不至为克林威尔所呵”（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；又，《李鸿章·序例》中亦有此言），也成为其传记完成时的自负之言。

以“四十八点钟”写成的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，无疑因采用新体，带给梁启超极大的兴奋，这才会有其后一气呵成的《李鸿章》。二作篇幅虽不相等，但其分章结构与著述笔调大致趋同。康传首尾的《时势与人物》、《人物及其价值》，相当于李传的《绪论》与《结论》，均先提出人物评价标准，最后为其人在历史上定位。中间的章节，康传先分期记述传主生平，再集中数章讨论其教育、宗教、哲学、政治思想，结构可称经纬分明；李传则直接以

事功为物履的分段标识,真正做到了经纬交织。如此写法,在中国传记史上实为空前之举。

在《李鸿章》篇首的《序例》中,梁启超虽攀比司马迁,称“夹叙夹论,其例实创自太史公”,并举《史记》中伯夷、屈原、货殖诸列传为例;批评“后人短于史识,不敢学之”,才造成了“凡记载一人事迹者”,“类皆记事,不下论赞,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”的陈套。但其实梁氏心中很明白,其以《南海康先生传》发端的新体传记,不只和单一叙事的“中国旧文体”截然不同;即使被他高自标举、“窃附斯义”的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,仅比较结构,二者也相去甚远。因此,康、李诸传应该另有源头。这就是《李鸿章·序例》第一条所点明的“此书全仿西人传记之体”,叙述人物“一生行事,而加以论断”。此种体式即为今日已然风行的评传。

新式评传既以议论成分大增区别于旧体传文,自然为政论家梁启超提供了特别的便利。读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以下各篇,你会感觉,梁氏运用此体格外得心应手,似乎评传这一体式天生是为他创造的。篇中那些随处流露的作者识见,实为其传记中最吸引人的“文眼”。尤其因为梁氏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心态,使所写各传也以熔铸新思想、新知识见长,而洋溢着对旧史正统意识的批判精神。仅以重在发明政术的《管子传》与《王荆公》二书为例。前著第一章《叙论》开篇即云:

今天下言治术者,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:曰国家思想也,曰法治精神也,曰地方制度也,曰经济竞争也,曰帝国主义也。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,新萌芽而新发达者。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,曰惟有此之故;中国人所以弱于天

下者，曰惟无此之故。中国人果无此乎？曰恶，是何言？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，有更先于欧美者。谓余不信，请语管子。

管子者，中国之最大政治家，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。……

如此浸淫时代意识的立说，很容易拉近读者与作为传主的古人之间的辽远距离。而《王荆公》中对于历史上一向被推崇的宋代名臣韩琦、富弼、文彦博、欧阳修，尽管也承认“其道德、学问、文章，皆类足以照耀千古；其立朝也，则于调燮宫廷，补拾阙漏”，亦有可观；重点却放在批评诸人“不揣其本而齐其末，当此内忧外患煎迫之时，其于起积衰而厝国于久安，盖未之克任”（第二章）。这些论断又使他与旧史拉开了距离。

当梁启超晚年在清华国学院讲学时，曾自出心得，教授“中国历史研究法”。内中有关“专传”（即评传）的部分，更近乎夫子自道。其言曰：

我的理想专传，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，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，横的竖的，网罗无遗。

并强调说明：“此种专传，其对象虽止一人，而目的不在一人。”就是因为梁氏的用心在借人物为历史写照，故要求“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，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”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“分论一：人的专史”第一章）来作传。梁本人所写的传记，也无一例外，均以关系到一代时局者为主人公。《李鸿

章》一名《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》，即是因“四十年来，中国大事，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；故为李鸿章作传，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”（《李鸿章·序例》）。同样，《袁崇焕传》之冠以“明季第一重要人物”，也是由于在作者眼中，袁氏属于那种“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”（《袁崇焕传》第一节）。可以这样说，人物一生行事与国家命运、朝代更替或民族前途息息相关，是梁氏选择为之立传的首要标准。

以梁启超创立新史学的眼光，兼之本人的流亡政治家身份，又使其传记写作自然地偏向为历史翻案一类。金兆梓即发现，梁氏的中国历史人物传所写之人，“班定远而外，类皆旧日治史者所不屑道”，且多有恶名，如管子的“器小”，王安石的“奸邪”，郑和为“奄竖”，张骞也“以凿空见病”（《梁著六种重版序》）。梁启超却另具只眼，别有情怀。作《管子传》，叹息“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，不少概见，而訾訾之者反倍蓰焉”；写《王荆公》，又称“每读《宋史》，未尝不废书而恸也”，因国人之“吠影吠声以丑诋之，举无以异于元祐、绍兴之时”（见各书第一章）。梁氏于是自觉义不容辞，一一为之洗净旧史家泼上的污垢，还原并提示出人物的伟大之处。

按照梁启超在《南海康先生传》中的定义，凡属人物，即可分为“先时”与“应时”两类：

先时人物者，社会之原动力，而应时人物所从出也。质而言之，则应时人物者，时势所造之英雄；先时人物者，造时势之英雄也。

出于对亲身经历的中国近代史的关切，梁氏虽曾选取“时势所造之英雄”李鸿章笔之于书，但其著述热情显然更集注在“先时人物”身上。因为在他看来，后者对历史的贡献更大：“为社会计，则与其得十百应时之人物，无宁得一二先时之人物。”这样，人类社会可以进步更快。统观这些先驱者，梁氏指出，其“最不可缺之德性有三端：一曰理想，二曰热诚，三曰胆气”。但也正因为超越了所处时代，故“其所志无一不拂戾，其所事无一不挫折，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，奇险殊辱，举国欲杀，千夫唾骂，甚乃身死绝域，血溅市朝”。此语不仅可用以状写梁启超所崇敬的王安石、袁崇焕，即在其师友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身上，也得到了应验。而为历史算总账，梁启超又坚信：“凡真人物者，必得最后之战胜者也。”（《南海康先生传》第一章）这些对传记人物命运的解说，其实也适用于作者本人。当年正亡命天涯的梁启超，何尝不是以“先时人物”自居？截取他最喜欢的《自励二首》中句，所谓“献身甘作万矢的，著论求为百世师”，“十年以后当思我，举国犹狂欲语谁”（其二），其心事不正与传中人物相通？

而梁启超一枝“常带情感”、“别有一种魔力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二十五节中的自述）的生花妙笔，则使其笔下人物一如作者之元气淋漓。透过梁氏以史家客观态度征引、考辨的大量文献，这些千古人物仍各具鲜活的个性与读者靛面。如《袁崇焕传》引余大成《剖肝录》，述袁氏虽被清人施反间计下狱，终以国事为重，手书招回受其蒙冤之惊吓而叛逃的部将祖大寿：“骑出书。寿下马捧泣，一军尽哭，遂踊跃即日入关，收复永平、遵化一带。”袁崇焕尽管含冤而死，清军却因袁部下仍为明战守不得议和，退回关外。梁启超评以：“盖督师一纸书，犹足以却敌也

如此!”感慨良深。而袁之孤忠报国、“浑身担荷、彻里承当”(第九至十一节),亦跃然纸上。梁氏的同歌同哭、感同身受,自易于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。也即是说,在其所推崇的“德”、“学”、“识”、“才”这“史家的四长”(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第二章)外,梁启超还能以“情”动人。其所作诸传之所以迭次翻印、历久不衰,这应该也是其中的一大“秘诀”。

梁启超所著传记集的出版情况大略如下:其赴美前发表在《新民丛报》上的四篇传记,即张骞与班超合传,嚆苏士、意大利建国三杰、罗兰夫人三传,1903年首次由上海广智书局辑为《中西伟人传》印行。1911年,《王荆公》与《管子传》亦被同一书局编入《中国六大政治家》书中,分列第一编与第五编。

1936年,梁启超遗著《饮冰室合集》(分《文集》、《专集》两部)40册由中华书局在上海出版,同时抽印《专集》中原刊于《新民丛报》的传记,分题为《中国伟人传五种》(其中《(黄帝以后第一伟人)赵武灵王传》作者署名“慧广”,非梁作)、《外国伟人传四种》,与《管子传》、《王荆公》并行于世。

1943年,金兆梓又在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,择取《管子传》、《王荆公》与《中国伟人传五种》,列入“梁著六种重版”目中,由已迁渝的中华书局推出。与以前诸版不同,此次重印本改用了新式标点。

以上所述仅为梁作较集中的出版行为,而由各书局单册选印者尚不计在内。如果考虑到传记单行本以外,梁启超的文章尚以《饮冰室文集》、《饮冰室丛著》、《饮冰室合集》等诸多名目不断编辑出版,集中大都亦包含传记,则其史传文字读者之众已可想而知。

今次,百花文艺出版社继重版《李鸿章传》(列入“二十世纪

四大传记”丛书)大获好评后,又将梁启超传记文之精华汇于一编,为今人的阅读与欣赏提供方便。而其受读书界欢迎,按之以往的经验,亦可预期。是为序。

2001年11月19日于京北西三旗

MING BEN ZHUBAN JI

***** 目 录 *****

序 夏晓虹 (1)

管子传 (1)

王荆公传 (100)

袁崇焕传——明季第一重要人物
..... (345)

南海康先生传 (371)

殉难六烈士传 (405)

管子传

自序

一国之伟人，间世不一见也，苟有一二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，永其国民之讴思。百世之下，闻其风者，心仪而力追之，虽不能至，而或具体而微焉，或有其一体焉，则薪尽火传，犹旦莫也，国于是乎有与立。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，知学其先民，则史家之职也。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，取精多而用物宏，其人物之瑰玮绝特，夔非他国之所得望，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，或持偏至之论，挟主奴之见，引绳批根，而非常之人，非常之业，泯没于谬悠之口者，不可胜数也。若古代之管子、商君，若中世之荆公，吾盖遍征西史，欲求其匹俦而不可得。而商君、荆公，为世诟病，以迄今日；管子亦毁誉参半，即誉之者，又非能传其真也。余既为荆公作“洗冤录”，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，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。——述之得六万余言。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，旬有六日成。新会梁启超。

例 言

一 本编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,其他杂事不备载。

一 管子政术,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,故论之特详,而时以东西新学说疏通证明之,使学者得融会之益。

一 古书文义奥赜,领解非易。《管子》一书,传世更少善本,讹夺百出,前此几成废书。明吴郡赵氏据宋本校正千百余条,即今浙江局本是也,然不能句读者,尚往往而有。古今注家益复寥寥。今所传房玄龄注,或云出尹知章,其讹谬穿凿,《黄氏日抄》纠之极多,盖《管子》之难读久矣。本编所引原书正文,而附旧注,时亦以己意训释之,或且奋臆校勘,凡以使人易解,武断之词,所不敢辞。

宣统元年三月 著者识

第一章 叙论

今天下言治术者,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:曰国家思想也,曰法治精神也,曰地方制度也,曰经济竞争也,曰帝国主义也。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,新萌芽而新发达者,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,曰惟有此之故。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,曰惟无此之故。中国人果无此乎?曰恶,是何言?吾见吾中国人之发达是而萌芽是,有更先于欧美者。谓余不信,请语管子。

管子者,中国之最大政治家,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。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,不少概见;而訾訾之者反倍蓰焉,此误于孟子之言也。

孟子之论管子也，与孔子异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，偶有微词，而一则称之曰“如其仁、如其仁”，再则叹之曰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”，岂非以其事业之所影响，功德之所沾被，不徒在区区一芥，而实能为中国历史上别开一新面耶？孟子之论管子，则轻薄之意，溢于言外，常有彼哉彼哉羞与为伍之心。嘻！其过矣！吾以为孟子之学力，容有非管仲所能及者。管仲之事业，亦有断非孟子所能学者。在孟子当时或亦有为而发，为此过激之言。而后之陋儒，并孟子之所以自信者而亦无之，乃反吠影吠声，摭迂极腐之末论以诋訾管子。彼于管子何损？而以此误治术，误学理，使先民之良法美意，不获宣于后，而吾国遂涣散积弱以极于今日！吾不得不为后之陋儒罪也！凡政治之进化，必有阶级。躐阶级而进焉，未有能有功者也。欧洲自十八世纪末，自由民权之学说披靡一世，用是开今日之治。此稍有识者所同尊也。虽然，当中世黑暗时代，全欧泯泯棼棼，其历史几为血腥所掩。于彼之时，能为诸大国巩固基础使继长增高以迄于今者，非孟德斯鸠与卢梭之学说，而马格亚比里与霍布士之学说也。而马氏霍氏之与吾管子，则地之相去数万里，世之相后数千岁，不期而若合符契。而其立说之偏至，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。

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，率分三派：其一曰主权在君主者，其一曰主权在人民者。此二说各有所偏，而皆不适于正，遵之以为治，而利皆不胜其弊。至最近二三十年间，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，翕然为斯学之定论。今世四五强国，皆循斯以淳兴焉。问泰西有能于数千年前发明斯义者乎？曰无之。有之，则惟吾先民管子而已！

美国现大总统罗斯福氏有言：“政治家者，政治学者之臣仆